

在孔孟之乡掘孔孟后裔的坟，在生产队的田里放毛主席的猪，也只有知青才有这“特权”。吟了《血色黄昏》，叹了《蹉跎岁月》，再哼一哼知青生活中那千韵百律的曲曲小调儿，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扒坟

梁平

扒坟，是当地老百姓的叫法。书本上文雅点，叫掘墓。不管怎么叫，这都好像是属于那种缺了八辈子德，断子绝孙的行当。绝没想到的是，在那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在那斯文圣地孔孟之乡，本人与一群知识青年居然在坟头上墓穴里抡胳膊挥汗大有作为了一番。

我们一群知青刚下到农村时，正值冬季农闲。生产队干部认为知识青年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能让他们闲着。有人出一主意：让他们扒坟。曲阜这地儿多年前已开始实行火葬，到了七十年代已难见到坟地了。据说方圆十几里，除了孔林，就剩下了本村东头一片没有墓碑，没有说道的坟地了。文革那年头，没人敢在这埋人，但时有传说：有大胆之徒半夜背着死人翻墙进入孔林，将死者匆匆埋在老祖宗旁边。

多年了，生产队干部没人敢领头动那块坟地。挖祖坟的事，有谁愿沾？由孔，孟，曾，颜，四大姓构成的村子，可别为了平坟一事惹出族群不合的麻烦来。眼见邻近的坟地一个个地消失了，加上上边的压力，自己这块坟地的存在成了村干部的心病。这下可好了，知青来了。他们既不信封资修那一套，又没有族群疙瘩的负担，由他们做这事再好不过了。所以扒坟的建议一出，立即就定了下来。平坟种桑，扩大队里的养蚕副业。

扒坟队由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团支部书记名义上挂帅。队员包括九个知青和六个农民，上下总共十七人。领头干活的是三代出身贫农，德高望重的孔庆和（我们称他为庆和叔）。我们下乡时，这村子孔姓家族辈份在“宪庆繁祥令德维”之间。庆字算是大辈的了，它比目前华府地区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孔令和女士还大三辈。让庆和叔带头，万一出了事，只有他能压得住。另外四个，俩男俩女，都是青年突击队的骨干，干活好手，又正好覆盖孔，孟，曾，颜四大姓。最后一个是富农子弟孟繁林。此人脾气随和，寡言少语，干活从不偷懒。三十好几了，还没娶上媳妇。为什么加一富农子弟？是为了考验我们？磨练我们？还是让我们监督他？阶级斗争的弦可一定要绷紧。

这片坟占地约五六亩，有大小坟包百十来个。小点的两三尺高，大点的四五尺高，最高的一个在中间，八九尺高，像鹤立鸡群的珠峰。没人说得清这坟的来历，估计也有几百上千年了。历代后人一年年地上坟，一层层地培土上去，也够愚公堆山的了。一般的坟洞空间都不大，只能容下一口棺材，上面石板盖着，四周或由三四寸厚的石板围起，或用砖砌。打开盖子时，通常要先透透气。人下去之前还要喝两口酒，或往身上喷上点酒，说是可避妖气。

严冬腊月，坟的表面冻得梆梆硬。一镐下去，只砸出一个白点，震得虎口生疼，还不敢戴手套，生怕在贫下中农面前露出娇气。手磨起泡，长老茧，生冻疮，腰酸腿疼，都是知识青年免不了的经历。干活虽苦，但也有企盼。每当揭开坟板时，总是希望看到金银珠宝什

么的。但总是失望。除了死人骨头和腐烂了的棺木，什么也没有。开挖那最大的坟头时，围观了不少人。为防不测，队里还派了几个基干民兵，站在四角持枪候着，刺刀都亮出来了。结果，除了多了两个连通的坟坑外，还是个空墓。盗墓贼早就光顾过了，掏得还挺干净，连个瓦罐都不给留下。值钱的东西没挖到，那些石板和坟砖却派上了用场。后来社员用它们为知青盖了新房。而在当时，农民们大都住的是土坯房。

每当中间歇息时，几个农民就绘声绘色地讲开了神鬼故事。唱主角的往往是庆和叔，而且他总是把情节描述得像真的一样。好几次，知青们忍不住问他：“你到底是听人说的，还是你自己碰到的？”回答得很肯定：“亲眼见的。”这下让受过多年唯物主义教育的知青犯了糊涂：到底有没有鬼啊？这朴实的老贫农，老共产党员总不能瞎编鬼神故事来腐蚀知识青年吧？本分点的只有富农子弟孟繁林了，有滋有味地在旁边听着，从不讲段子，也不插一句话。装的？

转眼间到了开春，大部分坟头已经平掉，小桑树也栽上了。村里仅有的几口机井正日夜不停地运转着，白天浇麦地，晚上灌桑田。一天晚上，知青小白和我被派连夜值班，为刚栽下的桑树浇水。天黑时，俩人来到地头。分工我在上游，负责开口，堵口。小白在七八十米外的下游，管打信号。并约定，水灌完一陇时，小白摇摇他的油灯，或吆喝一声。接到信号，我就改换新的一陇。

到后半夜，起了风。这时的人是又累，又冷，又饥困（当地方言）。西边还有些未扒的坟丘，在那也许可以避避风。自己一人刚走到那，就不知到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跟头。起身一看，倒抽了一口冷气。脚下是一个扒开了半截的坟，上面的石板被拉开了一个宽宽的缝，露出一个阴森森的黑洞。够悬的，差点就栽进去。这是白天收工前留下的活，说是晾晾它，跑跑阴气后再挖。

不知怎么地，身不由己地调头就跑。什么冷啊，饿啊，困啊，都顾不上了。边跑边给自己壮胆，“不怕，根本就没有鬼。”还不时地回头望望，生怕什么追上来。这一看不要紧，头发都竖起来了。好像到处都是鬼火，一闪一闪地。从坟地里挖出的死人骨头扔得满处都是，没有磷光也难。还有那不知是树叶还是烧剩的香纸，经风那么一吹，在坟堆里打转，有的飘悬在那里，上上下下，忽左忽右。还有那风，飕飕作响，伴随着庆和叔描绘的那些故事情节，铺天盖地都冲了过来。月光下，几个披一身白的，有的向你打招呼，有的朝向你这边奔过来，一下子像进了聊斋。奇怪的是，那些牛鬼蛇神没有张牙舞爪的，但个个长得都是富农子弟孟繁林的模样。真是活见鬼了，关他什么事？就在心神还没缓过来时，南面“嗷，嗷”的怪动静响了起来。又是一哆嗦。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是下游小白的声音，又该换陇了。你小子什么时候喊不好？偏偏在这时候。腔调都变了，肯定是吓的。

这下哪也不敢去了。老老实实地在地那头猫着吧。就这样，战战兢兢地熬到天亮。地浇完了，俩人凑到一起，打道回知青点。瞧了一下小白，脸都绿了。直想笑，可又笑不出来。这哥们儿这晚不知是怎么靠过来的？

当后来我们返城离开时，这块原来的坟地已完全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桑田。养蚕卖茧已成为这个村支撑壮劳力一个工五毛钱的主要副业。也算没辜负那扒坟“见鬼”的经历。唯一遗憾的是，当年没精确地点一下那些坟头的数目，说不准还能立个吉尼斯纪录什么的。

半碗面条

夏收的一个晚上，辛苦了一天的社员们晚饭后又聚集到我所在的第四生产小队的场院上。有预报说打明天起连续几天有雨，于是队里决定，连夜打场，把收下的麦子整好进库。辛苦半年了，岂能让它有半点损失。更重要的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有城市的工人老大哥正等着我们的公粮呢。

经过几个小时的突击，晒干了的麦子装了包，进了仓。其它的，该进屋的进屋，该堆的堆，该垛的垛，该盖的盖，该遮的遮。一切都安置好了。干活之前，队长就宣布：干完活后，队里请大家喝面条。此刻已过午夜，但劳累了一天的社员和几乎散了架的知青没人离去。每个人都在等吃那盼望已久的面条。

人们团团围着那两口临时架起的大锅，默默的等待着那起锅的时刻。面条在锅里翻滚着，看上去没那么白，像是全麦粉的。汤清清的，只有几个葱花飘在上面。炝过锅的棉子油味淡淡地飘了出来，真香啊！不一会，面条下好了，盛了面条的碗一个个的摆在了地上。有满的，有半满的，有汤多的，有汤少的。人们一涌而上，个个都专挑那盛得满满的碗，忙不迭地吃起来。顿时出溜出溜的声音响成一片。

本人端起一碗半满的，暗自窃喜。下乡前，没少学农，学工，学军，拉练。从这些集体活动中，得一宝贵经验：凡在无法饱吃的情况下，先吃半碗，然后在别人未吃完一大碗时，再抢得一大碗。这样总共可吃一碗半。此招曾与多位同学切磋过，也试过多次，从未失手。也许它可归于孙子兵法某个谋略，或增为第三十七计：以少谋多。想到这群农民中没有知道这雕虫小技的，有点得意。你们也就吃手里端的那一碗吧。

我端着这半碗刚出锅的面条，因是大粗瓷碗，手没觉得烫。可这面条和面汤是烫的。赶紧使劲地吹，用筷子不停地翻。但还是难以下口，你说这个急呀！看看别人怎么样？这一抬头不要紧，傻啦！有几个人已在那盛第二碗啦！带头的竟然是几个大姑娘小媳妇，好像都是铁姑娘队的。没错。就是她们。记得下乡的头一天，欢迎会上，十一个知青面对村民坐在上面，下面挤满了男女老少百十号人。就是这几个泼辣姑娘，挤在最前面，直勾勾地盯着男知青，手还指点着，不停地评头论足，吓得几个男知青半天不敢抬起头来，像是被批斗的的罪犯。没想到这帮铁姑娘连吃面条都是好样的，不服不行，再低一次头吧！

就那么一眨眼的工夫，两个大锅都见底了，可我这半碗面条还没下几口呢。别提有多么懊丧了。怎么狼吞虎咽的劲就是使不上呀？怎么知识青年的才智就没用了呢？怎么这孙子兵法也不灵了呢？看来向贫下中农要学的东西多了去了，要从吃饭这真本事上学起。

半碗面条下肚，虽然不饱，还是挺满足的。在那年月，玉米面饼子，地瓜（红薯）面窝头，榆树叶粥，自己腌制的萝卜咸菜，几乎天天如此。在一般农村，难得喝上碗白面做的面条，更何况是白给的。说实在的，这面条的味道远比不上几年后在上海吃的一毛钱一碗的阳春面，可这是自己这半辈子最值得回味的半碗面条了，最难以忘记的一次夜宵了。

毛主席的猪

一九七五年秋收刚开始的一个下午，知青之家猪圈里的三口猪不停地嚎叫着，声音传得老远，搅得四邻不安。它们是饿的。知青们连日来起早摸黑，累得精疲力尽，自己能吃饱，能扛过这个季节就不错了，有谁还顾得上这些猪呢？

三口五六十斤的猪，一白俩黑，长长的毛，本来就没有喂好，加上农忙没人顾得上，瘦得更没了猪样。俗话说，马瘦毛长，怎么猪也这德行。更奇的是，饿极了的它们，经过多次冲击（谁也不知道它们究竟试跳了多少次），竟然越过了三四尺高的圈墙，蹦了出来。这减了肥的猪也可以像马一样地跨栏了。

当累得散了架的知青们收工回来，发现猪全没了，直纳闷：这猪圈得好好的，怎么就没了呢？谁那么胆大，敢在大白天里偷知青的猪？何况知青院子里还养了条串了种的德国狼狗。这帮知青比较本分，没做那偷鸡摸狗的事，没得罪什么人啊！

两天后，有社员报告，几头半大猪在地里乱窜，啃倒了好几片玉米地。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了好多年了，又值批林批孔运动的风口浪尖上，竟有人胆敢把自己的猪放出来吃集体的庄稼。一时间，群情激奋，喊打声一片。抄家伙的，找绳子的，商量围剿策略的，甚至有提分肉方案的。

人群中有人突然冒出一句，那是不是知青的猪啊？有人附和着：不错，是知青的猪。打知识青年来到这村子开始，知青大院就成了村民们的消遣中心，每天都有贫下中农到知青院子串门拉呱（好像五类分子不敢来）。知青的那点家底全村没不知道的。知青喂的猪又瘦又长，像羊似的，都传成了佳话。

一说是知青的猪，人们静了下来。这知青可是毛主席派来的。这猪也就是毛主席的猪了。可不是吗。这猪是上级知青办赠送的，还是进口好品种，甚至还有迎接仪式，只因是在农村，没有当年城市里迎接圣果（芒果）那么隆重罢了。

这猪还能打吗？人们没了主意。村干部也为难了，“散了，散了，等队里合计合计再说。”就这一“再说”，几头曾经饥寒交迫的猪从此过上了一段难得的好日子。它们自由了，好像一下子成了一望无际青纱帐的主人。无所顾忌地逛过来，蹿过去，不知啃倒了多少待收割的玉米高粱，糟塌了多少生产队的菜地。

一天正当知青吃午饭的时候，这几只猪踱进了院子，一付酒足饭饱的样子。滚圆的身子，一走一晃。油光铮亮的毛，短短的，就像刚剃了的寸头。边走边哼，大有满腹经纶，

衣锦还乡的气派，够派儿的。怎么才一个来星期，满身的长毛就没了呢？真想象不出它们不久前的叫化子模样。嘿，发福了还没忘记知青这穷家，竟还惦记着这帮知青哥们儿。看到知青正在吃饭，几只猪凑了过来，抬起头，拱拱鼻子，哼了两下，然后到一边躺着去了。什么意思啊？是问候？还是笑话知青的饭不怎么样？

直到秋收结束，这几只猪就这样潇洒地来来去去。回来时，它们躺在院子中间晒太阳，打个盹。当午后敲钟，知青们疲惫地去上工时，它们也悠哉悠哉地下地了。大忙季节，自顾不暇的知青懒得管它们，也乐得不管它们。知青们曾听过养猪专家的经验介绍，也没少得到本村养猪高手的指导，可就是养不好猪。这下可省心了，不用管不用问，没几天，这猪就上膘了。一天，兼管知青的大队长安君叔来到知青院，碰巧见到这几头胖猪正躺在院中间晒太阳。苦笑地说了一句，“知青也会养猪了”。是啊，知青掌握了最经济有效的养猪方法，放猪法。确切地讲，是无人放猪法。但这放猪的办法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的。这要看是谁的猪了。

难得有知青享受特权的记忆。知青坐火车耍赖不买票，查票的来了，小红知青证一亮，理直气壮地递上四个字，“知青，没钱”。列车员一脸无奈地走了过去。没准她兄妹中就有知青。这知青放猪则是另一桩例子，不过这次真正享受到特权的是毛主席的猪。

山东省曲阜县姚村公社春亭大队插队知青 梁平